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摘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 目录

### 一、接管平、津

- (一) 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
- (二) 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
- (三) 平津的做法和经验
- (四) 进城以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 二、新中国的建立

- (一) 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新中国建设蓝图
- (二) 关于《共同纲领》
- (三) “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 三、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 (一) 进城前的思索
- (二) 天津讲话及引起的风波
- (三) 春耦斋讲话
- (四) 几点评说

### 四、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 (一) 组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财委
- (二) 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
- (三) 统一财政经济
- (四) 初战胜利的经验

### 五、调整工商业

- (一) 紧缩银根后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
- (二) 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 (三) 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和成效

### 六、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 (一) 党对富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 (二) 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 (三) 实施情况和效果

- 七、贯彻防腐蚀方针，开展“三反”斗争
  - (一)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反腐蚀斗争的重要性
  - (二) 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
  - (三)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 (四) 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 八、发动“五反”，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
  - (一) “五反”的发动
  - (二) 关系全局的上海“五反”斗争
  - (三) 要让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
  - (四) 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
- 九、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 (一) 争论经过
  - (二) 1950年争论的继续
  - (三) 今天的反思
- 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
  - (一) 1952年秋后的酝酿
  - (二) 总路线的提出和最后确定
  - (三) 回顾中的思索
- 十一、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 (一) 财经会议的起因：修正税制
  - (二) 财经会议的召开和会上对我的批评
  - (三) 周总理的结论和毛主席的讲话
  - (四) “误会”的解除
- 十二、统购统销的实行
  - (一) 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 (二) 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 (三) 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
  - (四) 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
  - (五) 改革中的评说
- 十三、“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 (一) “一五”计划的任务和编制过程
  - (二) 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 (三) 展开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布局
  - (四) 从实践中摸索的可贵经验
- 十四、关于高、饶问题
  - (一) 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 (二) 高岗向党发难
  - (三) 饶漱石紧密配合

- (四) 高、饶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 (五) 应该记取的教训
- 十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
  - (一) 关于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问题
  - (二) 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之争
  - (三) 失误在哪里
  - (四) 对“五月变化”的一种分析
- 十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
  - (一) 为什么编这部书
  - (二) 建国后的“第一次调查”
  - (三) 是非评析
  - (四) 社会效果
  - (五)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价
- 十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 (一) 出乎预料的速度
  - (二) 大势之所趋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形式的选择
  - (四) 成就和问题
  - (五) 1956年底毛主席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
- 十八、加快手工业改造的得失
  - (一) 我国手工业的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二) 建国头六年手工业改造的进程
  - (三) 加快改造带来的曲折
  - (四) 用发展的观点看得失
  - (五) 对三大改造高潮的几点看法
- 十九、《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
  - (一) 调查和探索的目的
  - (二) 汇报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 (三) 从听汇报到论十大关系
  - (四) 探索带来的新风
- 二十、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
  - (一) 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面临的新问题
  - (二) 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 (三) 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 (四)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 二十一、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
  - (一) 冒进倾向的产生
  - (二) 为组织好1956年生产建设反冒进

- (三) 为拿出一个实事求是的“二五”建议反冒进
- (四) 在探索中形成八大的正确决策
- (五) 为编好1957年计划继续反冒进

#### 上卷结语

#### 二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过程
- (三) 从讲话到论文的发表
- (四) 《正处》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过程中的曲折

#### 二十三、整风、反右派和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 (一) 发动全党进行整风的意图和方针
- (二) 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 (三)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教训
- (四) 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 二十四、批评反冒进

- (一) 批评反冒进的经过
- (二) 毛主席对反冒进问题的分析
- (三) 今天的认识

#### 二十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 (一) 成都会议的酝酿和讨论
- (二)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总路线
- (三) 一点评析

#### 二十六、“大跃进”的发动

- (一) 农业“大跃进”的发动
- (二) 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
- (三) “大跃进”第一个回合的得失
- (四) 从发动阶段看到的问题

#### 二十七、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一) 在“大跃进”中萌发人民公社的构想
- (二) 北戴河会议的讨论和决议
- (三) 超阶段空想的进一步发展
- (四) 从“共产风”看人民公社的弊病
- (五) 对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

#### 二十八、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

- (一)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提出
- (二) 1956年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方案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 (三) 1957年拟定的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 (四) 1958年的“放权”与“收权”

(五) 今天的一些认识

## 二十九、郑州会议开始纠“左”

(一) 毛主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提出要“压缩空气”

(二) 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 降低钢铁指标

(四) 读书、总结经验与逐步认识客观规律

## 三十、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一) 庐山会议的初衷

(二) 彭德怀同志的信

(三) 会议转向：从纠“左”到“反右倾”

(四) “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五) 党内斗争的深刻教训

## 三十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一) 违背客观规律行事而造成的惩罚

(二) “八字方针”的酝酿过程

(三) “八字方针”的初步执行情况

## 三十二、《农村六十条》的制定

(一)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个硕果

(二) “三月草案”的形成和内容梗概

(三) “六月修正草案”的新突破和重要补充

(四) 1962年的修改

## 三十三、《工业七十条》的诞生

(一) 在调查研究中诞生

(二) 条例的主要内容

(三) 条例的试行

(四) 对两个问题的说明

## 三十四、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一) 科研、高教、文艺等条例的制定

(二)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三) 成就和局限

## 三十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一) 大会始末

(二) 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分析

(三) 犯错误的根源何在

(四) 几点看法

## 三十六、西楼会议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一) 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二) 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三) 西楼会议在调整经济中的作用

### 三十七、八届十中全会和强调阶级斗争

(一) 会议的进程

(二) 对形势的不同看法和对“黑暗风”的批判

(三) 包产到户问题引起的争论

(四) 为何发生对“翻案风”的批判

(五) 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

### 三十八、开展城乡“四清”运动

(一) “四清”运动的由来和《前十条》的制定

(二) 运动的初步开展和《后十条》的制定

(三) 《后十条》的修正和“左”倾错误的发展

(四) 《二十三条》制定前后的思想分歧

### 三十九、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 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二)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措施

### 四十、试办托拉斯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试办方案

(三) 试办的初步成效和遇到的矛盾

(四) 初步总结

### 四十一、“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的展开

(一) “吃穿用计划”的提出

(二) 三线建设

(三) 成立小计委与备战计划的形成

(四) 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 四十二、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一) 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和各个领域批判的开展

(二)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三)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四) 历史的教训和启迪

###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一) 关于阶级斗争

(二) 关于经济建设

(三) 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四) 关于党的建设

# 一、接管平、津

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接管平津，是胜利实现这次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举行了奠基礼。我对建国以后党的若干重大决策与重要事件的回顾，就从这里开始。

## （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

1948年，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局。

6月8日，华北局决定将《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定名《人民日报》。

毛主席指示进北平要依靠工人阶级。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 （二）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

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党执政后重蹈季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大事。

——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

——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

少奇同志同我谈的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

1948年下半年，我们陆续接管了若干较大的城市。其中，济南和沈阳的接管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对我们做好平、津的接管工作大有裨益。

### （三）平津的做法和经验

2月14日中央曾发来一个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同志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我们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现在又制止专为欢迎党中央北平的集会活动。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开欢迎会……看起来是两件具体事，却有深意。它不仅体现了我党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党对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

中央对平、津接管工作抓得很紧，过问也很细致。

如果说过去的工作主要是破坏旧世界，今后则主要是建设一个新世界：

1. 区别对待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对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原则上是打乱、解散；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工厂、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旧有的各种税收除少数苛捐杂税外，原则上照旧征收；房产及其租赁关系照旧维持，房租照旧由房东、房客议定。此外，对待资本主义管理经验采取什么态度？首先，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订出办法和步骤，并经过宣传，群众有了准备，才能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企业旧制度；其次，要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发扬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动性。
2. 既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又善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接管城市企业工作的好坏，要看工厂机器是否照常转动，工人是否照常工作。除了原封原样接收好官僚资本企业，还要保护好民族工商业，制止各种形式的侵犯工商业的现象。
3. 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4. 立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5. 用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 （四）进城以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进城后，华北有的同志曾经产生过看轻农村的想法，看不到恢复城市经济仍然必须从农村做起，即从恢复和发展农村市场入手。

解决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在于发展农业，在于提高农民的购买力。

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中，怎样兼顾好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这两个方面，是一篇很复杂的大文章，要做好它是不容易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始终谨慎地处理好这些矛盾，防止出现大的偏差，以利保持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 二、新中国的建立

---

## （一）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新中国建设蓝图

1949年3月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张闻天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毛主席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以下五点：

1. 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
2. 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
3. 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
4. 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
5. 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建立在对国情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它的基本点是：

1. 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2.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 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4. 必须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5. 实现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的时间，毛主席曾多次估计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即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

## （二）关于《共同纲领》

1. 毛主席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构思。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2. 《共同纲领》中何以未写社会主义？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共同纲领》是行动纲领，是为着规范当时的行动而规定的；它不同于《宣言》，不是描绘新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图画。
3. 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 （三）“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1. 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就建国大计和增进两党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
2. 主动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3. 建国初期，毛主席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出兵抗美援朝。

# 三、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 （一）进城前的思索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随后，12月25日，他又在华北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这两篇报告中的观点，概括起来说，中心思想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理由是：

1. 条件不成熟。
2. 不能照搬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完全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了；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那样，它历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革命性的一面。
3. 客观上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

## （二）天津讲话及引起的风波

1. 他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
2. 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象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
3. 他强调，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
4. 他设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这时，少奇同志已想到了“和平赎买”的办法。

客观地说，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也有个别言词不妥当的地方。比如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就不妥当。当时朱德同志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讲得很好：为了工人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还必须“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

少奇同志在当时就指出了反“左”比反右更难，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时隔不久，围绕天津讲话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还是在党内发生了一场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

## （三）春耦斋讲话

1951年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斋的讲话（即对马列学院一班学员的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

1.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很长的，在10-20年。
2. 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
3. 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
4.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最后依靠重工业再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5. 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
6. 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

## （四）几点评说

1.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前，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来源于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也小有歧异。
2. 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与这种国情相适应的特殊办法。在这方面，列宁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教训。
3. 关于毛主席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毛主席的批评，着眼点是在“确立”二字上，并未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

# 四、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 （一）组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财委

1949年元旦，中央召开了一次财经座谈会，大家都不满意财经统一工作进展缓慢的状况，要求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5月31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

中财委是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央其他的一些财经部门也主要是以华北人民政府的有关财经部门为基础组建的。中财委为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拟定和准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大量工作。

## （二）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头一件重要工作，是在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这是上海会议强调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所谓政治观点，在那时就是要立足于革命战争的全局看问题，从全国的范围看问题，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的有效办法，坚定自己的信心。

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着眼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会议提出的又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要把财委建设成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这是陈云同志向财经领导机关特别提出来的要求。

上海会议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主要有4项：

1. 精简节约。
2. 在新解放的乡村抓紧征粮，新解放的城市抓紧收税。
3. 发行公债。会议原定发行2400亿元，因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对于现时发行公债一事尚有异议，所以中央决定推迟。
4. 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首先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稳住上海，恢复生产。

在上海会议上，还就急待统一的几个问题作了规定：

1. 统一规定了各地的秋粮征购任务、1949年8月至12月份的货币发行量和各区域之间的物资调拨计划。
2. 统一税率。
3. 建立由中财委领导的统一的发行库。
4. 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集中掌握几种重要物资。

建国伊始，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金融市场上的银元斗争，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同我们的初次较量。粮食和纱布市场上同资产阶级的较量，是继银元斗争之后的又一个回合。

### （三）统一财政经济

要害问题是，财政经济没有统一起来，收支脱节，中央财政缺乏坚实的基础，随时有出问题的可能：

1. 脱产人员就会超过1000造成沉重的负担。
2. 收入没有按计划完成。
3. 收支脱节。

所以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势在必行，收支脱节的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统一财经，主要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入，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统一财经后，时间不长，有些方面集中统一过多的缺点就开始暴露出来了。政务院通过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几个文件，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于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关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一般说我们还是重视的。从根据地时期起，我们就有一条规矩，叫做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建国后统一财经时，总的精神还是这个原则。……后来，毛主席又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要求把统一性和独立性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原则是有了，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

关于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管理企业化，逐步过渡到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制。

总的说，那时管理全国经济，我们还缺少经验。战争时期，有一些局部的经验，虽然宝贵，照搬也不行。学习苏联的经验，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中财委就请有苏联顾问。但是，我们也体会到不能依样画葫芦，因为两国的情况差别很大。

## （四）初战胜利的经验

1950年3月统一财经，同年4月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进一步稳定的可喜现象。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初战告捷。

经验：

1.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全党认识与步调的一致，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从而使政治优势加上它所转化的经济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我们的力量得到不断壮大。
2. 中国要恢复和发展经济，决不能走通货膨胀的道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两条。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别无出路。陈云说：“靠印钞票的路我们不能走，稳妥的办法是在税收上多想办法，打主意。”

## 五、调整工商业

统一财经管理和调整工商业，是建国初期所进行的两项重要工作。

### （一）紧缩银根后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

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

中财委当时分析，私营工商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的消失，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出现了一部分商品的滞销和生产过剩。
2. 供销对象变化后，工作一时衔接不上。从前依赖国外市场的，现在靠不住了；过去面向达官贵人的产品和服务项目，现在人民不需要了。

3. 占城乡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购买力很低，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有限，许多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商品因价高而买不起。
4. 私营工商企业大多数企业管理落后，人浮于事。

我们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和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1. 平抑物价的措施有些过猛。
2. 有些同志忘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忘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产生了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想法和做法。

1950年5月31日，华北局向中央作了专门报告，概括为8方面的问题：

1. 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品范围过宽、数量过大，有垄断一切的现象。
2. 在价格政策上打击私营工商业。
3. 税收重，税目多，手续繁，加上认购公债的任务也重，私营工商业难以承受。
4. 在金融政策上，公营贷款，一般占80%—90%；私营贷款则比重过小，而且还款时间限得过长，资金周转不过来。
5. 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后，京、津两地采取了适当降低工资，藉以维持生产的办法，避免和减少了失业。但许多地方没有这样做。
6. 在市场上大量商品已经滞销的情况下，国营贸易仍只吐不吞，实际上放弃调节市场的责任。
7. 在原料采购、分配上，对私商的限制多。
8. 在加工、订货和成品收购上条件也有些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润低，有时公方还不守信用。

华北如此，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

## **（二）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1950年夏，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定，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

### （三）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和成效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

7月6日，中财委就召开公私关系各种专业会议的方针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应该采取的调整措施：

1. 投放货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城乡交流。
2. 对私人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合理确定工缴费。
3. 在原料供应、资金供给等方面，实行公私大体平等的原则。
4. 划分公私经营范围。
5. 调整价格政策，使私营零售商有利可图。
6. 适当减轻税负，简化征税手续。

要落实这些措施，遇到的矛盾也很多：

1. 关于维持生产、救济失业与继续稳定金融物价的矛盾。中财委提出了四项措施，设置了两道防线。
  1. 掌握足够的纱布。
  2. 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地域。
  3. 吸收定期存款。以上三项措施是第一道防线。
  4. 必要时，采取第四项措施，即把军政经费推迟发放，并在短期内冻结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的大部分存款，或限制提款数量。这是第二道防线。
2. 关于减轻民负与平衡财政收支的矛盾。必须在努力减少支出上做文章。一是裁减国家机构的经费，二是限制工业投资。
3. 关于扶持私营工商业与发展公营经济的矛盾。调节的办法，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对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
4. 关于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利益与保障工人权益的矛盾。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6月、11月三次发出指示，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事后看来，有利有弊。从积极方面说，确实安定了失业者，他们看到新旧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迥然不同，从内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消极方面说，政府从此背上了统一安排所有失业人员的生活与工作的沉重负担，并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了一种由国家包下来安排劳动就业的制度。
5. 关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造成的矛盾。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总的看成效是大的，特别是把收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措施，抓到点子上了。

这次调整工商业的工作，由于抗美援朝开始，未能坚持做到底，还遗留下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使后来的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

## 六、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改革土地制度。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

这次土改进展比较顺利，主要是由于党中央在总结历次土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新情况，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

### （一）党对富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毛主席关于把富农和地主区分开来，在民主革命过程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思想，是在同“左”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采取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毛主席虽然没有参加六大，但是他拥护六大制定的对富农的政策。

但是，六大关于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争取富农中立的政策，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共产国际来信前，当时的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即指责苏区土地斗争中有“右倾保守观念”，走了“富农路线”。收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便立即作出了《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承认中国党在富农问题上犯了错误，并强调“在党内，也要坚决地反对富农”。

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以后，他对富农问题的政策思想能够比较顺利地为中心和全党所接受了。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五四指示》中一般不动富农的政策，同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富农的政策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但是也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实施。事实上，各根据地土改中，都动了富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总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为止，我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尽管想法曾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打击或消灭富农的。

平津解放前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始思考新形势下的富农政策问题了。

建国后新区土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是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一贯政策思想的体现。

## （二）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建国初期，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不同意见也很尊重，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突出的一例。

毛主席对于土改中怎样处理富农问题，本是胸有成竹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也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但中央并没有仓促决策，而是广泛征询各级党委和民主人士的意见。碰到不同意见，不是加以批评，而是耐心倾听，接受其正确部分。经过调查研究和广泛讨论，证实某些分歧意见是各以不同的农村情况为依据的，就在保持基本政策统一的前提下，具体问题的处理允许各地因地制宜，不搞全国“一刀切”。在和平时期，在重大政策问题上，采用这种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决策方法，有多方面的好处：一、可以做到集思广益，防止不应有的疏失，使决策更加正确周全，更加照顾到有特殊情况的地区；二、通过各种意见包括不同意见的交换、比较和讨论，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使正确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三、通过民主讨论，可以收到教育干部、提高干部政策水平的效果。

## （三）实施情况和效果

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土改中实施情况是比较好的。

不动富农经济目的之一，是中立富农，减少土改阻力。这方面确实收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在老区却掀起了一股不大的风波。华北除绥远省仅约500万人的地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改，京津两市郊区按大城市郊区土改法令进行土改，都依法保存了富农经济外，其余广大农村都于1950年春以前完成了土改，消灭了富农经济。新区保存富农经济，在老区干部群众中引起一些误解；多余土地财产被征收的富农，更有埋怨情绪。

新区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对这项政策的意义的认识，却有差距。刘少奇同志认为，这不是一个暂时的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毛主席当时虽没有对少奇同志这个观点提出异议，但他本人的多次讲话、书信、批示，谈到这项政策的意义时，着重点在于把它看成是顺利推进土改的一项策略。

1953年12月，经毛主席审查修改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正式宣布：“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直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这标志着“保存富农经济”政策不再坚持了。事实上，终止“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比这还要更早些。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步子搞得太急，土改中的事实表明行之有效的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在土改后未能坚持一段时间，对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 七、贯彻防腐蚀方针，开展“三反”斗争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毛主席在1951年底又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当年，党中央、政务院授命我主持“三反”工作。

### （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反腐蚀斗争的重要性

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 （二）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

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遵照毛主席关于“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在“三反”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主要的有：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以身作则，带头作自我批评，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检举和坦白交待；从反浪费入手，进而揭发贪污；组织专门队伍内查外调，重点审查；把“三反”与整党和考察干部结合起来；正确区别贪污和浪费的界限；对科学人才采取保护不伤的原则，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对机关生产采取“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等等。

据统计，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

在运动的高潮中，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伤害了一些同志，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 （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他们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刘、张的犯罪事实主要是：

1. 利用职权，盗用公款。
2. 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
3. 破坏国家政策。
4. 盘剥民工。
5. 腐化堕落，拒不悔改。

刘张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但在他们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统治下，一直未能公开揭露。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气候，这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 （四）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几件事情：

1. 延安整风期间听毛主席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列为整风文献，让全党高级干部学习。
2. 1945年7月初，黄炎培（字任之，社会人士习称“黄任老”）先生等5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黄任老返渝后，发表了著名的《延安归来》。
3. 1949年10月毛岸英同志写的一封信。“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 八、发动“五反”，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

---

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经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场斗争，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量。斗争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向党、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猖狂进攻，对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 （一）“五反”的发动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毛主席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作一场经济斗争，也是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

## （二）关系全局的上海“五反”斗争

在“三反”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发动“五反”斗争，对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部分经济部门的工作几乎停顿，国营企业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冲击；加之资产阶级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来要挟我们，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过程遇到了障碍。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适时地调整“五反”部署，采取措施，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在运动的部署上，决定适当缩短持续的时间，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暂不发动“五反”，县以下的“五反”推迟到春耕以后，中等城市尚未开展运动的也要视情况进行安排。在经济工作上，毛主席提出，“五反”斗争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从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是相当严重的。选择恰当的斗争方式，对于保证“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经与陈毅同志和华东局负责同志商量，决定把“面对面”的斗争方式改为“背靠背”的斗争方式。让全市72家较大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几乎包括了上海工商界的全部头面人物，而且大都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集中起来开会学习。上海市委选派得力干部参加，利用群众揭发出来的材料，促使他们在学习中坦白交待违法行为。其他中小私营企业也仿照这样的办法，分期分批地解决问题。大体上做到了斗而不乱，避免了前一个阶段发生的偏差。

在广州，我就运动处理阶段的几个政策问题，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了四点意见：

1. 慎重处理违法资本家的退财补税问题。

2. 上层资本家中应有一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就需要打破单纯按违法数字大小定案的标准，适当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过去的贡献等因素。
3. 工人监督生产势在必行，但其中问题甚多，应重点试验，俟取得经验并经中央批准再行推广。
4. 妥善解决“三反”和“五反”的联系问题。

### **（三）要让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

“五反”运动确实“痛整”了一下不法资本家，但是，也带来一些“后遗症”，对经济生活影响不小。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5月9日，中央批转了华东的三个材料（华东局副局长谭震林同志关于“五反”后引起的新问题的报告浙江省委关于“五反”问题综合报告、上海市委关于“五反”后的情况报告），就善后处理中的有关政策性问题的规定，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工作，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

### **（四）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

这是在“五反”结束后进行的。前一段主要调整工业，降低银行利率，增加放款，扩大加工定货及收购产品；后一段着重调整商业。内容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也涉及劳资关系。

调整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1. 市场能否繁荣起来的问题。
2. 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问题。
3. 继续发挥私营商业作用的问题。私商营业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商业政策有缺陷造成的：
  1. 国营商店与城市合作社的零售业务发展速度太快。
  2. 在价格政策上，批零差价不适当地缩小了。
  3. 有些地方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对付私商，阻挠他们的经营活动。

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五反”运动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步骤。

## 九、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 (一) 争论经过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三部分组成：问题的提出；省委的主张；几个具体问题。

省委的主张是：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和五省互助合作会议多数同志的意见，华北局于5月4日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并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山西省委“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

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这以后，毛主席针对少奇同志和我们华北局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 (二) 1950年争论的继续

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就其实质来说，是1950年春天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争论的继续。两次争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土改完成后，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0年春的争论，是围绕东北富农问题展开的。高岗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少奇同志认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东北地广人稀，情况与关内不同，处理东北农村问题，更应考虑东北的特点。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谈话纪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少奇同志的谈话传达到东北局后，张闻天同志三次通过东北局给毛主席写信，就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张闻天同志这三封信虽没有提到高岗的总结，也没有提到少奇同志的谈话，但看得出来，他是就这场争论向中央表示他自己的看法的。除富农党员问题外，关于阶级分化问题，互助合作问题，也是对高岗某些“左”的做法提出批评。

### （三）今天的反思

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来衡量，少奇同志关于山西省委报告的处理，是有缺点的。我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

1. 少奇同志的批语和我的文章都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一起，笼统地说成“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帽子太大，难于为当时党内大多数干部所理解和接受，而且也没有说清楚。
2. 没有指明我国当时虽不具备普遍建立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但并不排斥可以寻找向高级社过渡的具体形式。
3. 由于过分强调了合作化要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前提，华北局向中央的报告还提出要以土地国有化为前提，因此，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只有先机械化和土地国有化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并不符合我国国情。
4. 此外，少奇同志对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发展方向大事的报告有不同意见，既未同毛主席商量，也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就在多种场合进行严厉批评，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至少是不够慎重的。

当然，上述这些缺点只是认识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不是什么路线问题，把他的批语当作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它及时抓住了刚刚露头的妨碍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三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

1. 过分害怕农民自发倾向引起的两极分化。
2. 把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
3. 离开工业发展去谈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 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

### （一）1952年秋后的酝酿

建国之初，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短短的3年内就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留下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当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已在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毛主席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

毛主席的这种构思，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毛主席提出这种新的构思，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虑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1. 实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
2. 国家已掌握了重要的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工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国营经济已占主导地位。
3.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统一财经、稳定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办法，加强了管理与监督，并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使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4. 农村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部分地区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有的还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5.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战争的威胁并未消失。

## （二）总路线的提出和最后确定

把实现“一化、三改”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毛主席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经过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有关的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到12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 （三）回顾中的思索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毛主席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最先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大家都重新进行思索，不再坚持原来那种设想和说法了，即“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说法不确切，往往容易使人们把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分割开来，往往容易使人们把新民主主义理解为一种必须加以“确立”和“巩固”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制度，而不认识它是一种过渡形态的制

度。因此，明确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虽然只是“四字”之差，但在认识上已起了质的变化。

无庸讳言，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工作中是有缺点的。当时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完成“一化、三改”，今天回过头来看，时间还是打得短了一点。在执行过程中一再“加速”、“加快”，以致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过渡，“一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改”的工作也做得很粗。我们后来在建设和工作中，多次发生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和其他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也不能不说与此是有关联的。

## 十一、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 （一）财经会议的起因：修正税制

修正税制有两条原则，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从保税而不是增税出发：（1）工业总分支机构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缴纳三道营业税；商业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要交两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的做法；（2）为了堵塞漏洞，规定工厂直接卖货给零售商时，须将工商两道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3）取消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从简化税制、变“多种税，多次征”为“多种税，一次征”出发：（1）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等22种（国营工业能够大量生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环节上能够控制的）商品的货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一种商品只要缴纳了商品流通税，就可行销全国，不再交其他各税和附加，大大简化了纳税手续；（2）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曾设想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商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理由是：“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它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一意见。

修正后的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

毛主席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

## （二）财经会议的召开和会上对我的批评

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13日会议正式开始，我宣读了财政方面的文件，并做了简要解释。会议第一、二周（6月13日-27日），先是按六大区分组（块块），后是按专题分为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税等四组（条条），讨论财政工作中的问题。第三周（6月29日-7月4日），由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同志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第四、五周（7月6日-18日），主要是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到第五周星期一（7月13日），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有131人参加，由我作第一次检讨。从此会议中心转为批评我的错误，都是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方式进行的。这可以说是这次财经会议的一个转折点。第六周（7月19日-25日），到北戴河休息三天。回来后，由李维汉同志作《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第七、八、九周（7月27日-8月13日），继续举行扩大的领导小组会和各种专题座谈会。这次会议原定会期半个月，由于中间发生了变化，一直开到8月13日结束，长达两个月。

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既没有实现毛主席关于讨论总路线的意图，也没有认真讨论五年计划、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几个月后，真相大白。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串连。高岗对陶铸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

1955年3月21日，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高岗利用财经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进攻”。

## （三）周总理的结论和毛主席的讲话

由于高、饶的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与毛主席的原意大相径庭。毛主席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总理尽快做结论。我既然已意识到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而是进而攻击刘、周，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我决定再不多说一句话。当时会上要我作第三次检讨，我拒绝了。周总理把我的态度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确实是很难作结论的。毛主席出了个主意，让周总理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陈云、小平同志讲了话，会议气氛起了变化，结论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在怀仁堂召开大会，陈云同志主持，周总理做总结报告。毛主席对总结报告作了多次修改。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8月12日，他在怀仁堂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1. 说明“三反”、“五反”运动后他主要考虑和警惕的问题。他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而特别重视和警觉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2. 批评“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他说，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
3. 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
4.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
5. 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

## （四）“误会”的解除

毛主席和党中央随着对事情的真相一步一步地了解，对我的“误会”也在一步一步地消除；对财经会议上对我不恰当的批评也一步一步地作了修正。

# 十二、统购统销的实行

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第二次大战役的，就是1953年开始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到1985年改行粮棉合同订购制度为止，这个在特定条件下开始实行的农产品统购制度，持续时间长达32年之久。而统销制度的一些基本内容现在还在实行。

## （一）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新中国诞生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

## （二）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陈云同志共提出了8种方案。其中7种被否定了：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不搞统一办法，由地方各行其是。可选择的只剩下又统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了。不过，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

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

## （三）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

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

## （四）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

在部署了粮食统购统销之后不久，中央紧接着部署了食用植物油的统购统销，第二年又部署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1956年初，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转变。农业合作化后，农产品购销制度怎么办？要不要推行苏联的义务交售制？是形势提出的新问题。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此态度都很明朗：不赞成。

经历“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统购统销制度又作了若干新的规定：1960年10月以后，实行“超购加价”办法。1961年9月以后，实行售粮奖售工业品制度。1961、1962年严重困难时期，国家对那些暂时确有困难、以后有能力归还的生产大队实行粮食借销。1958年2月，曾经将中央管理粮食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经历“大跃进”之后，1962年9月收回，重新实行中央统一集中管理。1955年一定三年不变期满之后，1959年、1965年重新定产、订购、定销，规定一定三年不变。1971年又重新定产、订购、定销，规定一定五年不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渐有所放松。1985年，用合同订购制度代替统购派购制度。

## **（五）改革中的评说**

物价稳定，是“一五”期间我国成功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之一。而统购统销的实行，是创造这一条件的决定性的步骤。

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

# **十三、“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 **（一）“一五”计划的任务和编制过程**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步骤。它的基本任务，是依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确定的。从1952年着手编制，到1955年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前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 **（二）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置其他事业于不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农业和轻工业不相适应的情况逐步暴露出来。我们正是在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前提下，适当地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使“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良好的。

## **（三）展开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布局**

“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即“限额以上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内有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

每当回顾“156”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

## **（四）从实践中摸索的可贵经验**

1. 计划任务一定要实事求是。
2. 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
3. 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中几个重大的关系。

## **十四、关于高、饶问题**

---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党就揭露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 **（一）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 **（二）高岗向党发难**

高岗向党发难，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1953年下半年。这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他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之一。

明显表露高岗反党意图的是他散布的“军党论”（即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军队变成他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工具。

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 （三）饶漱石紧密配合

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可是，他一当上组织部部长，就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反对少奇同志，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 （四）高、饶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毛主席已逐步察觉高、饶的活动不正常。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严肃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高岗以自杀（未遂）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 （五）应该记取的教训

1. 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
2. 共产党人不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
3. 党中央处理高、饶问题是稳妥的和慎重的。

【以上为2022-03-22错误覆盖后，恢复的2022-03-09的历史版本】

## 十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

---

从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开始，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就是比较快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发展，又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就是1955年夏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空气：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不仅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前进，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和1956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冒进。

党内进行的这一批判，反映了毛主席同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的邓子恢同志之间，在关于浙江省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和全国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存在的重要分歧。

## （一）关于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问题

浙江省在反对饶漱石错误思想后，对合作化产生了盲目的积极性，有些地委提出“抓两头，带中间”（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之类的错误口号，省委农工部没有及时纠正。

为帮助浙江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邓子恢等同志开会作了研究，并将讨论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浙江压缩了1.5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大部分转成互助组。

毛主席察觉浙江收缩合作社问题后，曾向邓子恢同志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结论中谈到“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一提法时说：“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

这个问题的分歧实质是两点：一、对办得很不好的合作社怎样处理二、对浙江1954年秋后农业合作化发展形势怎样估量。

1981年3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党中央批准这个请示报告的意见。请示报告指出，经过调查核实，浙江省1955年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贫农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实践证明，这样处理是符合群众要求的。有的地方由于酝酿不够，行动过猛和工作粗糙，对不该收缩的也收缩了一些，这是在具体执行中的缺点错误。”

## （二）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之争

继浙江整社问题出现意见分歧之后，邓子恢同志和毛主席之间，从1955年6月下旬起，又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争论。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把这场争论概括为大发展与小发展之争。

邓子恢同志在中国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个根本道路和根本方向问题上，和毛主席的意见是一致的，并没有分歧。对合作社的发展要有控制数字，这一点也没有分歧。但是，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他们的指导思想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始，邓子恢同志就主张，中国互助合作运动要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毛主席也讲过要稳步前进，但其基本指导思想却是强调：“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超额完成，情绪很高”。如果说，1953年反对“冒进”与反对“下马”的分歧，是这两种指导思想之争的第一个回合，那末，1955年夏的“大发展”与“适当发展”之争，则是这两种指导思想之争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回合。

两种指导思想的不同，反映出对一系列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有关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

1. 在农业合作化目的方面各有侧重。邓子恢同志侧重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要有利于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毛主席则侧重于强调要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大力发展生产力。
2. 在加快合作社发展步伐的可能性方面各有不同的认识。邓子恢同志比较强调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毛主席则比较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的最大的可能性。
3. 对合作化的阶级政策方面，毛主席提出了新的观点。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

### **（三）失误在哪里**

1. 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于求成。
2. 对党内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

### **（四）对“五月变化”的一种分析**

在整顿巩固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发展新社这两大问题上毛主席并不是一开始就对邓子恢同志采取批评态度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是支持的，而且可以说是积极支持的。毛主席认识上的变化，是发生在1955年5月。

邓子恢等同志也察觉到了毛主席思想的变化。这些年来，有些历史研究著作中把这称为“五月变化”但都尚未涉及或说不清导致变化的原因。

我推测，毛主席在1955年内，对邓子恢同志的工作，从支持转向批评，可能同他对农村形势估量的变化有关。四五月间，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毛主席这次外出巡视工作，是他对农村形势认识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他沿途所看到和听到的，了解和发现了不少新情况，有些是先前不曾了解和发现的，有些过去虽然了解可能这次发现事实有出入，他所说的大家办社很积极，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沿途向毛主席汇报的材料，无疑大多数会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其中也可能有不那么真实的，或者包含汇报者某种主观成分，或者有些以偏概全，或者甚至可能有虚夸的东西。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都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这种现象对于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是很危险的。

## 十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同志1955年主编的一部书。这部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材料书，共收集各地材料176篇，90多万字，仅汉文版就发行152万册。毛主席亲自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为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望。它的出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一）为什么编这部书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毛主席希望通过这部书对农业合作化中“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进而引导其他战线也批判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

## （二）建国后的“第一次调查”

毛主席是不辞劳苦，精心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材料的选择，既照顾到四面八方，使之具有代表性，又尽量作到出类拔萃，使之具有典型性。对文字的加工修改，则力求刮垢磨光，精益求精。

## （三）是非评析

现在有些人对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对《高潮》这部书当然也全盘予以否定。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高潮》一书有关说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的材料和按语，就整体而言是可信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按语中有些思想的基本精神，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失它的指导意义。这主要是：

1. 检验合作社标准的思想。
2. 勤俭建国的原则。
3.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原理。
4. 用积极的态度克服困难、治穷致富的思想。
5. 农业多种经营思想。
6. 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些重要倡议。
7. 尖锐地提出文风问题。

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它的失误，一方面是来源于对形势估量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一政治概念缺乏科学的解释。

## （四）社会效果

《高潮》树立的某些典型，按语中倡导的某些思想，在我国人民中有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积极作用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农业合作化的范围。

但是，《高潮》一书所发生的消极作用也要估计够。由于《高潮》序言肯定“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号召其他战线也反对“右倾保守”，扩大建设规模和加快建设步伐，因此它一出版，就为正在召开或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财政会议、基本建设会议等加了温，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的偏向。

毛主席在《高潮》一书中，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农村阶级政策的思想，除了在农村容易造成一种越穷越光荣的错觉以外，对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方面产生唯成分论的偏向也有重要影响。

短短几个月内，我国农村就一举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许多地方没有经过初级社，甚至也没有经过互助组，就在个体农民基础上直接组织高级社。两年后，高级社的位置还没站稳，又来了个公社化。这是一个巨大的、严重的但不是正常的变化。促成这个不正常变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高潮》一书着力宣传高级社的优越性，并提倡社的规模越大越好，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 **（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价**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伟大的，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从农业合作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必须把带领农民群众摆脱贫困状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主要体现在这里。

还要认识到一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经发生的一些失误，有的在当时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的又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对农业合作化作出正确的历史估价，还有一个怎样看待搞群众运动的问题。既然是搞群众运动，一点毛病不出，一点后遗症不留下，那是不大可能的。一旦大规模地搞起来，有些行动就难以控制住了。即使及时发现某些偏差，但在运动的“惯性”冲力面前，想纠正也很难完全纠正。

## **十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年头。这年的5月到10月，毛主席集中精力发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接着又发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除了按照规定领取带有剥削性质的定息以外，整个企业已经归国家所有了。这是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一步。

## （一）出乎预料的速度

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一结束，毛主席立即部署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之后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

## （二）大势之所趋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是大势之所趋。这既是建国头六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

## （三）全行业公私合营形式的选择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不是偶然的。它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统筹安排的产物。

1954年这一年合营了800家较大的资本主义工业；私营工业1954年以来就遇到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方面的困难，日子不好过。这两件事汇到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矛盾：把生产容易安排的大户合营了，剩下为数众多的小户就更过不下去了。

1955年上海市在制笔、棉纺等七个行业搞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等方式创造了企业的合并和合营的经验。

对资本主义零售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对小商贩进行全行业安排改造，也是从解决1954年以来私商遇到的困难中逐步寻找到的形式。在这方面率先创造全行业合营经验的是北京市。

全行业合营同个别企业合营相比，是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仅进度快，而且两种合营企业也有质的不同。单个合营企业仍然单独计算盈亏，全行业合营后就全行业计算盈，亏这便于将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陈云同志认为，定息制度把企业生产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质点：此时的企业，严格说已不是公私合营企业，而是实际上的国营企业了。

## （四）成就和问题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行业公私合营又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定性步骤。这一合营的胜利，对于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工作的缺点和偏差有三：

1. 时间过于急促。
2. 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3. 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

## （五）1956年底毛主席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1956年内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陆续有所发现，并着手解决，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除党的八大从理论观点到政策思想已作了比较系统的解决，记载了主要的探索成果之外，毛主席于1956年12月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又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毛主席的三次谈话，贯穿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毛主席这次谈话提出的定息不变、时间延长等意见，后来付诸实施了。可惜，它的基本精神，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把资产阶级当作财富、社会变革不能太快等，没有能够付诸实施。拿定息很少的人可以放弃定息，摘“帽子”、进工会的意见，也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 十八、加快速手工业改造的得失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建国头6年，是从供销入手，稳步前进的。但是，从1955年冬季开始，改造步伐急剧加快了。加快改造的决策，还导致了手工业合作化后不久又出现一个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新阶段。

## （一）我国手工业的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个体手工业同个体农业比较，就其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来说，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1. 都是分散的、小规模个体经济。
2. 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户中的中农贫农一样，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都自食其力不剥削别人，而且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
3. 生产不稳定容易发生两极分化。

个体手工业不同于个体农业的特点主要是：

1. 没有多少生产资料，资本有机构成比农业还低。
2. 个体手工业经济是小商品经济，它的生产活动离不开市场，通过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同其他经济和消费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 行业众多经营灵活。
4. 技术传授主要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上述特点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必须同农业合作化有明显的区别。

## （二）建国头六年手工业改造的进程

我国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定了下来的。

1950年7月，中财委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1952年8月，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组织和管理合作社的经验。1953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1月，全国合作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三种组织形式：

1. 手工业生产小组。
2.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
3.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手工业管理局。12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1955年5月，中央在批转会议报告时指出，对手工业供产销和手工业改造，要同时考虑，要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 （三）加快改造带来的曲折

1955年下半年，在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冲击下，农业合作化一马当先，随后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对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向高潮作了部署。在这种形势下，手工业改造的步伐也急剧加快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四“过”的缺点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的主要表现是：生产上盲目集中，组织形式上一律合作，管理上统一核算。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1. 群众不方便了。
2. 原来分散经营的供销关系割断了，因为等待生产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原个体手工户不接受零散定货，而合作社的统一经营一时又建立不起来，致使生产停顿。
3. 吃“大锅饭”，出“大路货”，产品品种减少，质量降低，某些传统名牌产品失去了原有传统风格。
4. 合作化后，不管师傅和徒弟，大家都是社员，原有的师徒关系淡薄了甚至割断了，这对技术传授是不利的。
5. 由于盲目集中，缺乏厂房和生活服务设施，一时造成混乱，使手工业者本来就不多的财产受到损失。

这些问题的发生，除了在指导思想对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有些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缺点以外显然同忽视手工业的特点也是密切相关的。

应该指出，党中央从发动手工业改造高潮开始，就估计到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一边发动改造高潮，一边提醒下边注意防止发生这些问题。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到合作化就算完，而要继续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发动改造高潮时就确定了的。

就在手工业合作化高潮时，有些地方已出现了向新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平调的苗头，挖走合作社中的能工巧匠，某些管理部门把自己归口管理的手工业合作社视为自己的企业。

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地方国营工厂从总体上说是不成功的。它是在一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以为生产关系越高级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不正确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社会变革。它把本来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手工业者或手工业合作组织中的绝大部分纳入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的体系，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成为国家的一个包袱。

## （四）用发展的观点看得失

1955年冬天开始，手工业改造出现的急于求成盲目集中，以及后来的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无疑是工作中的一些失误。这些失误，不仅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某些曲折，贻误了时间，而且长期遗留了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例如某些特种手工技术失传等）。但是应当肯定：这些失误或迟或早地作了纠正。在高潮中正是对盲目集中、统一核算等现象纠正及时，才保障了1956年和1957年手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 （五）对三大改造高潮的几点看法

我从本书第15篇开始分别对个体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高潮的形成、发展和问题作了回顾。现在综合起来对三大改造高潮谈以下几点看法：

1.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当长的时间”多长？今天看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多利用几年，是否会更好些？
2.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党是注意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
3. 50年代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商品经济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的东西。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能把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管理体制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飞跃。
4. 回顾这些历史我们看到三大改造高潮的发动，由于认识上的问题有其难于避免的原因。

# 十九、《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

## （一）调查和探索的目的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

少奇同志听取各部委的汇报。毛主席外出调查。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

“汇报工程”的目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也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 （二）汇报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1. 关于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
2. 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
3. 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从经济上看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即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
4. 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
5. 关于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 （三）从听汇报到论十大关系

毛主席于4月25日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5月2日，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

按照“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总结讲稿。

部分没有整理进去的内容，主要是就以苏为鉴戒和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未发表的材料说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当时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斯大林的种种具体批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完全是从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着眼，避免给人以口实。

## （四）探索带来的新风

《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毛主席率先探索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也发生了良好的影响。1956年到1957年头几个月，我们党内掀起了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

党的八大展示出一大批探索成果：

1. 最重要的是八大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对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的观点是个重大突破。
2. 陈云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
3. 李富春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
4. 我在发言中讲到的那个有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方面提出的三条杠杠。
5. 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

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出现人口问题的大论战。

## 二十、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我国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党中央从新形势、新任务出发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这是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也是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体现。

### （一）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面临的新问题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大批新建扩建工厂的陆续投产，旧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生产建设中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我们愈来愈感到建设人才的匮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愈来愈感到这方面的矛盾很突出。主要表现是：

1. 科技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
2. 对现有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多问题。
3. 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

### （二）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周总理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总理在报告中还尖锐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和弱点。

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原则的解决办法。

周总理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任务时，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到会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谈知识分子问题和向科学进军的话不多，但分量很重：

1. 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
2. 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3. 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
4. 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
5. 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意义深远。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

### **（三）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至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涉及高科技领域和应用技术以及培养人才等多方面的课题，需要集中大批专家和全国的协作才能完成。

1. 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了规划制定工作的顺利进行。
2. 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对规划的正确制定和组织实施起了重要的作用。

规划任务的实现解决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并为以后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建国后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发生过多次摇摆？

1. 建国以后的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
2. 对知识分子使用的问题上思路太窄。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

3. 过去的多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挫伤太大。

## 二十一、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反冒进，不仅使当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1957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

### （一）冒进倾向的产生

毛主席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

1. 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
2. 他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1956年1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40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之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

现在看来，1955年冬季，毛主席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

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包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那些指标）的拟定和执行问题，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我们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肩上。

## （二）为组织好1956年生产建设反冒进

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

1月20日，周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5月11日，周总理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后，6月15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作了报告。批准这个报告的大会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这是一个“总的方针”。

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提前到来。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也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 （三）为拿出一个实事求是的“二五”建议反冒进

6月人代大会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之后，周总理立即把自己的精力转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1956年反冒进抓的第二个题目。

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回顾编制“二五”计划建议中的困境时说由于钢、粮等指标过高“各部、各省市就要跟上去煤、电、油是这样机械工业是这样这样就根本没有法子平衡”。

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

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后来，虽受到批评，但在经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1960年6月18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 （四）在探索中形成八大的正确决策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

1. 根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
2. 根据反冒进中积累的认识成果，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策。
3. 根据对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初步改进体制的正确决策。
4. 把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八大文件，使它正式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正确方针。
5. 根据法制建设方面探索的成果，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作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
6. 在党的建设方面一项重要决策，是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 （五）为编好1957年计划继续反冒进

一些讲1956年反冒进的书籍和文章，只讲到八大以前有的还只讲到月人民代表大会以前。其实不仅6月人大之后就是月八大之后还继续反了一段冒进。这最后一个阶段的反冒进主要是围绕着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而进行的。

11月10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毛主席后来把这次全会看成反冒进的“集中表现”。

1957年2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实践证明，1957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 上卷结语

---

在建国后的头7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辉煌的。工农业生产高速地健康发展，经济效益良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改善和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长足进步；党和人民政府励精图治，清正廉明，人民当家作主，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群关系密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工作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真正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道德风尚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强不息，表现出摆脱了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中国人民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焕发出来的巨大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新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新的形象、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在这7年中，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主要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在三大改造以及其他一些局部工作中，确实开始产生了急躁冒进的苗头，出现了过急过粗过快的偏差和缺点。这些偏差和缺点的发生，毛主席当然有责任。但是，发生这些偏差和缺点，不能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别人也有责任。我们所以能够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首先应该归功于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且写过一些好文章，提出过一些好思想。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确定的指导这个时期工作的总路线和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是正确的。

## 二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

###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主席为什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概括地说，不仅是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面建设时期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

由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即敌我矛盾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基本解决，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则逐渐大量显露出来，突出起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

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这些闹事，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问题。然而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却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

波匈事件连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揭露，极其尖锐地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是摆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过程

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就多次尖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错误，反复指出，这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对于党内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十分注意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的提法），这正是保证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矛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

1956年上半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辉煌成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

## （三）从讲话到论文的发表

《正处》从讲话到6月19日公开发表，经历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发表讲话？毛主席这篇讲话，听的范围，传达范围，都十分广泛，党内外都希望有正式文本问世，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掌握。

发表稿和记录稿相比，究竟作了哪些重要的修改？

1. 删去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
2. 删去了对若干有“左”的倾向的文章（以及有右的倾向的文章）的批评。
3. 删去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实例。
4. 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
5. 增加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断。
6. 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

## （四）《正处》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过程中的曲折

《正处》的公开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正处》对马克思主义究竟作出了怎样的理论贡献？

1.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2. 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实践上早已这样做了，只是第一次作理论说明）。
3. 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然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

## 二十三、整风、反右派和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 论断

---

整风、反右派是1957年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它们的性质本来是不同的，但在实际进行中又搅在一起，因而讲整风不能不讲反右派，讲反右派也不能不讲整风。

### （一）发动全党进行整风的意图和方针

这次整风运动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发扬延安整风传统，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的重大举措。它经历了一个酝酿、准备过程。整风的目标很明确，针对性很强，就是为了改进我们党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中出现的新问题。

1957年4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1957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欢迎。

## （二）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在整风初期，我们党为了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虚心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意见。但是，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欺骗和煽动一部分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从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后发制人。

6月8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的《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此后，中央连续发出指示，《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指导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

## （三）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教训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

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其教训在哪里？我看主要有三条：

1. 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2. 明确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
3. 不应把整风和“肃反”弄在一起。

## （四）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的论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主席和我们党为什么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从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

实践证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

## 二十四、批评反冒进

1957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人心振奋。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这次批评，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随之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 （一）批评反冒进的经过

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进行的。1957年9、10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批评反冒进的开端。1958年1月6日，毛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其中两次谈到批评反冒进的目的。4月上旬，毛主席又到武汉主持召开了一次汇报会议。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毛主席修改工作报告时，在这里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 （二）毛主席对反冒进问题的分析

毛主席对反冒进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1. 关于反冒进问题的性质。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认为反冒进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二是认为反冒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2. 关于反冒进同右派进攻之间的联系。毛主席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
3. 关于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毛主席认为，要弄清大局小局，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
4. 关于平衡和不平衡的问题。毛主席认为，造成反冒进的另一个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平衡，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5. 关于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政治设计院”是章伯钧1957年在向党进攻中的用词。毛主席借用这个词来批评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搞分散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

## （三）今天的认识

从总体上来说，批评反冒进是不适当的，批过了头，为以后的大冒进开了路。

长达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样一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干部头脑就膨胀起来了，反过来又影响毛主席的思想。结果导致了“大跃进”的发动。

不适当的过火的批评，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不利于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性。这次批评反冒进，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

## 二十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相继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当时人们惯称的“三面红旗”。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执行中的巨大偏差，这次工作重心转移的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

## （一）成都会议的酝酿和讨论

1958年3月11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建国以后8年中间逐步形成的。

至于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快些、好些，当时是缺乏深入研究探讨的。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关于这一点，党内是存在着思想认识分歧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就是这种分歧的反映。针对这种分歧，毛主席先是提出了两种建设方法问题（即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和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后来在批评反冒进中逐步把它上升到两种建设方针、两条建设路线的高度。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就是在两种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先后出现的。

成都会议对于总路线的形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毛主席认为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说：从1921年到1942年，用了21年时间才形成了自己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8年中逐渐形成的，时间不算长，严格说还不算完全形成，大约再有5年就差不多了。还说：许多东西自己就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些东西究竟对不对，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我看至少还要看5年。我们证明了的东西只有一条，就是革命。至于建设，还没有证明，只是有了初步的东西。

可惜的是，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未能把他这个正确的思想贯彻好。在他说这段话不久，紧接着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出现了更严重的“左”的错误。

## （二）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总路线

5月5日，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对总路线进行了系统论述，把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五次讲话，同总路线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跟先进看齐。
2. 为什么总路线省略了主词：我们这个6亿人口就是我们的主词。

3. 总路线是怎么产生的：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的，有苏联的经验，也有中国多少年的经验。

绝大多数代表对这条总路线的提出表示拥护。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有117人，书面发言的有140人，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他们列举本地区的成绩经验，说明总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和指标。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认为“这次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结果”。“在党的路线已经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

### （三）一点评析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是不是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1. 不重视综合平衡。
2. 只强调从精神上激发人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原则。
3. 多快好省，从字面上看，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都包含进去了，都有了。但是，没有一系列合乎实际、合乎规律的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合理的经济体制乡经济管理方法来保证，单靠鼓干劲、争上游，是很难全面实现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的，即使一时达到了，也是很难维持住的。而且，在多快好省四个字中，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突出了多、快，而未能把它同好、省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促进。

## 二十六、“大跃进”的发动

1958年到1960年，在我国历史上习惯称为“大跃进”的年代。发动“大跃进”，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的挫折，教训非常深刻。我作为当时主管工业交通方面工作的副总理，对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的发动负有一定的责任。

## （一）农业“大跃进”的发动

1958年发动“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毛主席重视的农业增产措施，除大兴水利建设之外，就是耕地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

采用自上而下刮大风式的推动工作的方法特别是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声中，即使是正确的指示，也难免被扭曲，往往弄得面目全非；更不用说一系列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一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经验被拔高为普遍经验加以推广，所带来的副作用了。

副作用中最大的，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

离奇的粮食高额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即把许多块市壮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并到一块田里）假造出来的；也有一些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然而，当时各级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对此却置信不疑。领导机关以这样的典型作基础，对1958年粮食、棉花总产量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对1959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粮棉产量提出了高得出奇的指标。

在一派浮夸气氛中编制的1959年计划的第一本帐和“二五”计划的第二本帐，粮棉指标也很高。

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 （二）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

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12月2日，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令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2月3日，我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这个指标后来就称为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一本帐。

按照南宁会议关于三本帐的部署，地方报来的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国家经委于4月14日汇总报告党中央，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二本帐。

鉴于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在逐步缩短，”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指标在逐步提高，5月26日到30日召开的第48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改定为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本帐。

《汇报提要》上，1958年的钢产量预计为1000万吨，后来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批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1958年产钢1100万吨的任务，虽然在6月20日就作了布置，但7月间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

### （三）“大跃进”第一个回合的得失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大体可分为两个回合：我们现在讲的1958年“大跃进”算第一个回合；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为第二个回合。

“大跃进”的第一个回合，国家和人民是有所得的。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所增强。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有些成绩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拿到手，从总体上来说，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

1. 投入很大，经济效益很低。
2. 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
3. 企业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 （四）从发动阶段看到的问题

首先，应当肯定：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出发点是对的。其次，一些经济指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提得很高的。再次，还应当肯定，1958年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并且推行某些改革，将管理权限下放，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大方向也是正确的。

然而，“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从“大跃进”的发动阶段，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一些问题：

1. 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
2. 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
3. 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
4.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5. 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

## 二十七、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

### （一）在“大跃进”中萌发人民公社的构想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火花。

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多地的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酝酿了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1958年6月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

毛主席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的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 （二）北戴河会议的讨论和决议

1958年8月17日开幕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共有17个，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是其中之一。

毛主席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1. 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
2.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
3.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4. 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5.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可以提。

6. 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
7. 办人民公社，要试，一个县要有一两个试点，不要一哄而起。

经过讨论，8月29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六个部分：

1. 关于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2. 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目前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宜。
3. 关于小社并大社和转为人民公社是广大群众共同要求。
4. 关于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中心是强调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5. 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过程中的麻烦。
6.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肯定现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作好准备。

### （三）超阶段空想的进一步发展

1. 徐水模式的宣传和推广。
2. 张春桥文章的发表和讨论。
3. “非现金结算”观点的提出和流传。
4. 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或准备过渡的单位。
5. 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从农村滚滚冲向城市。

### （四）从“共产风”看人民公社的弊病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超阶段空想论的进一步发展，农村里刮起了一股强烈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村里第一次大刮“共产风”的过程。

“共产风”，即把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民或农业合作组织的财产误以为是共产主义的那种坏风气，早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前就已经显露苗头。

“共产风”所以连绵不断，清理后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认真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的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共产风”，可以说是人民公社的诸多弊病的集中表现：

1. “一大二公”的弊病。初期的农村人民公社大体是平均由2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一个公社。28个社的“共产”，首先就是在28个社中，原来的穷社共富社的产。公有化成分越多，无偿平调的“共产”范围则越大，不少办社干部认为，社越大，越好平调，权力和名气也越大。
2. 分配制度的弊病：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初期人民公社分配收入中，真正按劳分配的部分微乎其微。新华社1959年1月18日内部报道广东省新会县人民公社第一次发工资后，出现“四多四少”和“三化”，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
3. “三化”弊病。为像战争时期支援前线那样大规模地无偿地调用农民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也带来了对部分生活物资的平调，房屋和生活物资私有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
4. 政社合一的弊病。导致不讲经济效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因地制宜单凭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什么事情都“一刀切”的重要根源，因而也是以强迫命令大刮“共产风”的一个重要根源。

如果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发生“共产风”的主要契机是“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那么，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三级所有体制之后还继续刮“共产风”，主要契机就是急于过渡了。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向中央的报告，几年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平均每人被平调财物48.89元。在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1961年农民平均年消费水平为68元），农民家底很薄弱而币值又高的条件下，被平调走这么多的财富，无疑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股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摧残和对生产力的破坏。

## （五）对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

1. 当时为什么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估计得那么短？
  1. “大跃进”迷雾的影响。
  2. 国际共运“接力棒”和当时赫鲁晓夫举措的影响。
2. 毛主席为什么看中了人民公社的模式？
  1. 有照搬马克思的概念并扩大了这些概念运用范围的问题。
  2. 有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问题。
  3. 可能还有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
  4. 还可能与中国文化遗产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
3. 为什么不切实试点？
  1. 对公社化引起的社会震动估计不足。
  2. 不正确地接受了农业合作化中层层下达控制指标的教训。

## 二十八、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

实行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人、财、物和产、供、销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条条专政”，既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对企业管得过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助长官僚主义作风。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55年开始酝酿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逐步下放管理权限，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方针，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办更多的事情。可是，在“大跃进”期间，又形成了下放失控的混乱局面，不得不在调整中回收管理权。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当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并没有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掌握规律，只是局限于在行政管理权限上做文章，要么中央管，要么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没有抓住如何搞活企业，使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畅通，使经营单位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问题，形成了人们通常形容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循环，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 （一）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提出

1955年，毛主席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同志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着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下放权。

毛主席对各地的这些反映极为重视，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讲到经济管理体制要改，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要只发挥中央一个积极性，要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毛主席经过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在4月2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特别是主张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企业在实施经营、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思想，在1956年“三大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之际，毛主席就率先向全党提了出来。

### （二）1956年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方案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国务院根据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于1956年5月和8月间召开全国体制会议，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根据国务院的讨论，组织了各部门和国务院参事室一批专家参加的工作小组，起草出《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这里所称的国家行政体制，也就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作者注）。

其要点略述如下：

1. 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职权的原则。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事业（包括有关的计划、财务和人事管理），尽可能多地交给地方管理。
2. 计划管理。健全和加强全面综合平衡和分级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3. 财政管理。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收入的划分上，应保证中央和地方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要使中央能够对各地方的收入进行必要的调剂，以便保证各地方预算收支的平衡；在预算支出的划分上，应以企业、事业和行政机构的隶属关系为基础。
4. 工业管理。原则上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经营管理。
5. 基本建设、农业林业水利、运输邮电商业、文教科学卫生、政法、劳动、机构编制、民族自治区。这些方面，也都按照分权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作出了改进的规定。

### **（三）1957年拟定的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1957年初，党中央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和改进体制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具体负责，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同志组成，陈云同志为组长。

我于8月下旬向五人小组提出了一个改进计划制度的意见书。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1. 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计划工作制度。
2. 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制度。
3. 简化计划程序和不必要的表格，使各级计划机关集中精力加强调查研究和综合平衡工作。

9月24日，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发言。他着重讲了四点：

1. 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
2. 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
3. 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4. 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但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

## （四）1958年的“放权”与“收权”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要求把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近900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到省市区，并完成交接上作，可见当时改进管理体制的决心是非常之大的。单从改变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手续来说，那是容易办到的。但是，要协调好人、财、物和产、供、销的关系就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如不能理顺关系，就会产生中央部门和省市区之间的相互掣肘，给企业造成困难。

由于企业下放过猛，加之下半年开展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不仅打乱了企业间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而且出现了各地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职工，以及平调国营企业设备、材料的问题从而导致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

为了扭转经济发展的混乱局面，《人民日报》于1959年2月24日发表题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

3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企业隶属关系的通知》，决定将有关全局性的34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4月28日，国务院又发出通知，批准21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领导，24个企业原由地方管理改由国务院有关部与地方双重领导。从此，中央又逐步上收企业的管理权。

## （五）今天的一些认识

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影响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进。在进行改进之初所拟定的草案和规定，步子是稳的，带有试验的性质，以求取得经验后逐步使体制的改进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大跃进”的形势一来，把改进体制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做法上也匆匆忙忙过于草率，认为只要把大部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就可以一蹴而就，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教训，就是当年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只是看到了权力高度集中存在的弊端，因而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地方下放权力；下放多了，又往上收权，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而完全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

## 二十九、郑州会议开始纠“左”

---

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 （一）毛主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提出要“压缩空气”

在毛主席的耐心启发和教导下，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紧张工作，终于迈出了纠“左”的一步，取得了最初的成果。

毛主席在察觉到“大跃进”中泛滥起来的“左”的错误之后，从1958年10月中旬到12月，为了开始纠“左”，他一路奔波夜以继日地非常之紧张地工作了两个多月。

## （二）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问题，形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郑州会议记录》。

毛主席指出，人民公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经过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的讨论，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中，作出了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为了提高这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一定的管理权限。”

这样，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际上就退回到了原来的高级社或部分初级社的规模，问题也就较好地解决了。

### （三）降低钢铁指标

八届六中全会时，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同志觉得还是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意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

从1949年下半年起，我就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做经济工作。他常常在关键时刻，对经济工作提出真知灼见，是与他平时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反复思考论证分不开的。

5月23日，陈云同志主待财经小组会议，指出：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 （四）读书、总结经验与逐步认识客观规律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认识上的原因（当时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动摇，就认为“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这个前提下纠“左”，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庐山会议后期出现反复就不足为奇了），未能一以贯之。

毛主席在纠“左”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和领导方法是有长远意义的。我感受较深的有三点：第一点，要经常读一点书。第二点，要“唯实”。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但仅仅满足于好心，是很不够的。第三点，认识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

## 三十、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

1959年的庐山会议，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但它却开成了错误地批判“以彭悠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会议。

## （一）庐山会议的初衷

本文所讲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

参加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中央负责同志（常委中陈云、小平同志由于身体原因未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和工交、财贸各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开始时，毛主席提出了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即：（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4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意见还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即第19个问题——作者注）。

## （二）彭德怀同志的信

彭德怀同志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虑。他后来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不迎头赶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谁能料到，就是因为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进程和性质，也给彭德怀同志本人招来了一场大祸。

彭德怀同志究竟写了一封怎样的信？用一句话说，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同志的信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写这封信，在程序上也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是完全正常的，而且信的内容也是正确的。

## （三）会议转向：从纠“左”到“反右倾”

彭德怀同志的信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

由于毛主席23日的讲话和26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一场“反右倾”的风猛烈地刮了起来。在各小组会上，普遍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信是原则错误，方向错误。许多发言上纲为反对总路线，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常委连续两次开会，批评彭德怀同志，实际上是在算“历史总帐”：毛主席指出，彭德怀同志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说彭德怀同志31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又说彭德怀同志与他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会议认定彭德怀同志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活动，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并说彭德怀同志“要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改造世界”，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

会议强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就是要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开始，毛主席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第二是路线问题”。

毛主席讲话后，全会先开小组会，后开大会。不论小组会，还是大会，其中心内容都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其倾向是“一边倒”，几乎是异口同声。

## （四）“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

“反右倾”在政治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

“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

## （五）党内斗争的深刻教训

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

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场悲剧中，应该吸取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哪些经验教训呢？

1. 一定要实事求是。
2. 不能搞所谓“新帐老帐一起算”。
3. 不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
4. 不要“刮风”。

## 三十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

60年代初期，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通称“八字方针”。但是对于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动“大跃进”运动这一错误决策，并未能从根本上认识；相反，还指望稍加调整后重新实现“大跃进”，这当然也就不可能全面正视和彻底纠正了！因而，“八字方针”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才定了下来，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大跃进”的轨道，第一年收效很不理想，以致经济困难的局面延续数年之久。

### （一）违背客观规律行事而造成的惩罚

1960年，即“大跃进”的最后一年，我国的经济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1. 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
2. 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
3. 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 （二）“八字方针”的酝酿过程

1958年，钢和粮食的产量都没有实现翻番的任务。

在拟定1959年计划的时候，多数同志主张继续翻番，以陈云同志为代表的少数同志认为指标过高，难以完成。

在拟定1960年计划时，也曾考虑在上年调整的基础上，继续搞好综合平衡，指标留有余地。但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影响下，许多同志的头脑又热了起来调整根本无法进行。

7月5日至8月10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7月16日，当时的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并撕毁经援合同，停止供应我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对我施行经济压迫。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又不冷静思考和处理问题了，反而提出要炼“争气钢”，要争取当年生产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任务。这样，就使得会议没有对经济的调整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8月30日至9月5日，国务院审议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大家赞成这些设想。周总理认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 （三）“八字方针”的初步执行情况

1960年11月15日至23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传达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并提出了1961年的计划安排要点。李富春同志在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造成国家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除了客观因素如天灾外，计划指标定得偏高、各项比例关系失调是主要原因；1961年计划的方针，就是要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1961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结果，计划的执行情况相当差，绝大部分指标不但距原计划相差很多，连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甚至比上年还低。

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认识之后，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才落到了实处。

## 三十二、《农村六十条》的制定

60年代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以后简称《六十条》或《农村六十条》）草案和修正草案，是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的制定和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动乱屯农村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农业所以能够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同《六十条》继续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

### （一）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个硕果

1961年3月广州工作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

综观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这样说，什么时候全党都重视调查研究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处处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我们的决策就比较正确，工作就比较顺利，或者即使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失误，也比较容易纠正，重又继续前进；什么时候调查研究不被重视甚至偃旗息鼓了，工作中的问题就多起来了，以至出现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在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思想中，我觉得有三个思想是尤为突出的，也是他经常加以强调的，因而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躬行实践的：

1. 强调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的思想。
2. 强调领导干部做系统的调查研究的思想。
3. 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对一段时间内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上下一齐动手做调查研究的思想。

### （二）“三月草案”的形成和内容梗概

《草案》10章的小标题，依次为：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社员家庭副业；社员；干部；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除第一章带综合性性质外，其余各章基本上讲的是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和社员、干部的权利、职责和义务，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制定公社工作条例的基本要求。

草案坚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的体制，规定：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在生产大队范围内，除了生产队和社员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外，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根据毛主席关于公社类似联邦制的设想，草案规定：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

草案根据新发现的问题，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公社一般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也不强求一律令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同的规模，由社员根据具体情况民主决定。

草案根据部分地区的经验，采用“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办法，处理生产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即：生产大队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超过“三包”指标的给予奖励。

关于分配问题，草案基本坚持1960年11月3日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规定：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草案提出：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它从属于集体或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零星开展荒地饲养猪、羊、兔、鸡、鸭等家禽家畜，也可以饲养母猪。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当地耕地面积的5%，长期归社员使用。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归社员支配。除了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外，其他的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

草案规定：公社占用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宜超过大队劳动力总数的2%；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宜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3%。大队扣留的公积金公益金，一般控制在大队可分配收入的5%左右。若干年内，公社不提或少提大队的公积金。

草案规定：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根据党的政策，加强对公社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但是，不能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日常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

从上述摘要中可以看出，草案的许多规定，是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作出的。从后来的反映看，其中解决得比较好的，是社队规模问题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

### **（三）“六月修正草案”的新突破和重要补充**

认识上的新突破，主要是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新增写的条文主要是山林问题，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

1. 关于食堂问题。“六月修正草案”第36条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后来，毛主席听说绝大部分农村公共食堂散了伙，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2. 关于供给制问题。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把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看成是“共产主义因素”。而今，原草案第33条第2款被全部删掉了，只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这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
3. 山林问题。增写了《六十条（修正草案）》中的第21条。主要是明确山林一般归生产大队所有，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不便于生产队经营的，组织专业队经营；大队和生产队每年编制采伐计划，实行按计划采伐，不在计划之内的采伐，大队和生产队有权制止。
4. 关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的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 （四）1962年的修改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规模只二三十户左右的生产队，并规定至少30年不变，是1962年6、7月间对《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改的主要之点，也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模式重大突破。

根据各方意见，又做过几次修改，9月29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后来十几年内对农村人民公社和整个农村工作起指导作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增写：“有些生产大队，现在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只要群众同意，就应该积极办好。”

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出卖。”

《修正草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更加注意了条例的灵活性和因地制宜。

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也是有缺陷的：

1. 仍然保留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这个重要的僵化观点。
2. 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修正草案，堵住了通向“包产到户”的可能性，使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戛然而止了。
3. 八届十中全会修改后的《六十条》，贴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记。

## 三十三、《工业七十条》的诞生

1961年9月16日，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工业七十条（草案）》）。这是当时用于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章程。但是，随着城市“四清”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工业七十条（草案）》实际上被扔到一边。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被林彪、“四人帮”诬为“瓦解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指导这一条例起草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受到许多毫无道理的攻击。

## （一）在调查研究中诞生

毛主席在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指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

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交会议讨论。

##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

1. 规定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五定”、“五保”。。“五定”是：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保”是：企业对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2. 限制企业党组织对生产行政工作的干预过多，禁止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引申到车间、工段和科室。
3.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
  1. 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及其责任制。
  2. 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管理责任制。
  3. 有条件的企业，设立总会计师，实行以总会计师为首的财务管理责任制。
4. 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载入条例。
5. 明确规定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6. 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
7. 重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
8. 规定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力集中在厂部。

### （三）条例的试行

《工业七十条（草案）》同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见面后，受到广泛的拥护。

一些企业党委书记则对条例草案提出批评。他们说：“今后党委没事干了”，“党委书记不好当了”。

国家经委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1965年对条例草案进行修订。

这次修改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四清”运动的经验，强调了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除政治思想工作有专章外，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和工人的团结、民兵、支部建设等，也都单列了一章；另一方面，强调了技术工作，原《七十条（草案）》中有关技术管理的内容基本保留了。

此时，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正在酝酿中间，整个中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中央书记处还未来得及组织讨论修正草案的初稿，”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 （四）对两个问题的说明

1. 国营工业企业的地位及其经营管理权问题。它对国营工业企业的地位及其经营管理权的规定，是不明确的，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当时提出的“五定”，只是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并没有作为长期目标。同时，当时认为“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也是相对的，即只相对于“大跃进”时把企业完全看作是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而说的，不可能把企业看成是与政府脱钩、面向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2.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大跃进”中既然暴露了许多矛盾，为什么《工业七十条（草案）》还加以坚持，而不恢复党的八大以前的厂长负责制？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是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一长制；也因为党的八大以后，大多数同志把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看成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问题。

## 三十四、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

60年代初期，我们党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为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给一部分划错了的“右派”摘了帽子。

## （一）科研、高教、文艺等条例的制定

最先制定出来的是《科研十四条》，主要内容是：（1）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2）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3）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勤俭办科学；（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大兴调查研究；（14）健全领导制度。

《高教六十条》，各章的标题是：（1）总则；（2）教学工作；（3）生产劳动；（4）研究生培养工作；（5）科学研究工作；（6）教师和学生；（7）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8）思想政治工作；（9）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10）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1）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努力提高创作质量；（3）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4）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5）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6）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7）加强团结，继续改造；（8）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归纳起来，这些条例重点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红”和“专”的关系问题以及坚持“双百”方针问题。
2. 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并规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的秩序，保证根本任务的完成。
3. 改善党对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领导。

## （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陈毅同志1962年3月提出了“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同时，党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以下两方面采取了措施。

1. 为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
2. 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

### （三）成就和局限

在科学技术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学校迅速走上正轨。

在文艺方面，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历史局限：主要是对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一些“左”倾观点、错误认识，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清理，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因而对这些领域发生的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而且不久就出现了反复。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突出强调阶级斗争，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条例很快就被搁置了，许多政策又出现了大的反复，“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

## 三十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 （一）大会始末

1961年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9日，会议分组讨论了为少奇同志准备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第一稿。1月10日会议结束，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即开幕。会议原定1月28日结束，只开18天。因《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延长了一些时间，还因毛主席1月29日讲话中提出了开“出气会”的建议，故会议延长，一直开到2月7日才闭幕。

周总理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令主要是围绕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

1月2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与会者。

会议的“第二个高潮”，从1月29日下午毛主席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就是“出气”。

## （二）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分析

1. 对严重困难的估计。
2.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3. 对错误责任的分析。

## （三）犯错误的根源何在

“七千人大会”上，大家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条：经验不够；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分散主义严重泛滥；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只反右不反“左”等等。

## （四）几点看法

这次会议有几个好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1. 犯了错误，就严肃认真地对待，勇于正视，努力纠正，这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
2. 创造良好的民主气氛，让大家充分讲话，真正实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地委，省委，直至中央），上级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反复进行讨论。
3. 各级领导同志勇于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

当然，这次会议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

## 三十六、西楼会议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少奇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会议连续开了3天，主要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讲透，并且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 （一）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陈云同志分析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 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
2. 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
3. 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
4.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
5.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陈云同志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措施：

1. 把十年经济规划（指“大跃进”中拟定的1963年至1972年十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
2.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3.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4.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5.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6.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西楼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

3月13日，少奇同志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日至4日，中央财经小组举行扩大会议。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1962年5月7日至11日，党中央在北京又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部署，要求大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估计困难，扎扎实实地工作，把经济调整好。会议提出了当时全党着重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一是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切实加强农业。

## （二）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 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把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等各项事业调整好，使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

2. 下决心减少城镇人口，动员那些“大跃进”时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就食”，以减轻城镇粮食供应的负担。
3. 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
4. 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
5. 抑制通货膨胀：严格现金管理；严格财务管理；严格物资管理；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日用品，并确定一些商品卖高价，以回笼货币，平衡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
6. 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 （三）西楼会议在调整经济中的作用

按照西楼会议的决策，经过全党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 三十七、八届十中全会和强调阶级斗争

---

1962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

### （一）会议的进程

建国以后，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有个毛病，就是当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或实际上并不那么好而误以为很好的时候就容易头脑发胀，不那么谦逊谨慎，或在思想政治上出现“左”倾，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盲目冒进。

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议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议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为全会准备文件。

毛主席说，这次长达两个月的会议，讨论的是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 （二）对形势的不同看法和对“黑暗风”的批判

毛主席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

## （三）包产到户问题引起的争论

1961、1962年，在全国一些农村，群众创造并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是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经营方式的自发的否定，也是为克服农村遇到的严重困难应运而生的。

但是，对这种受欢迎的责任制形式，中央和华东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

1962年4至7月，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思考甚多。

邓子恢同志坚信“责任田”的办法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南下，派秘书田家英同志率调查组到湖南农村调查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调研后，田家英的态度发生转变，赞成农村可以搞包产到户。

小平同志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陈云同志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

1962年7月上旬，毛主席从邯郸回来，主意已定，对邓子恢、田家英同志主张“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少奇、陈云、小平同志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

8月5、6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讲话后，形成了一边倒，对“单干风”（实际是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

## （四）为何发生对“翻案风”的批判

彭德怀同志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后来当他知道会上再次受到了批判，他不得不进行辩解和申诉。1962年6月16日，他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

8月22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

两封信送上去以后，被认为这是彭德怀同志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闹翻案，是根本否认他1959年所犯的错误，根本否认“反党集团”问题，是向党进行的新的进攻。

在八届十中全会前的预备会议上，9月3日毛主席曾召集小范围会议，布置要把彭的两封信拿到全会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 （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

从北戴河会议开始，最初的意图是要解决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会议召开一个多星期后，毛主席认为，不抓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会议展不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点沉闷。现在需要务虚。于是，毛主席在会上多次专门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毛主席“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段话后来成为“十年动乱”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主要依据。

## 三十八、开展城乡“四清”运动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

### （一）“四清”运动的由来和《前十条》的制定

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主席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后，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

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经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5月20日正式发出，后来把它称为《前十条》。

## （二）运动的初步开展和《后十条》的制定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立即在一批社队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

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随即发出。这个规定草案，后来称为《后十条》。

《后十条》与《前十条》相比，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其相同处，主要是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同处，主要是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做了许多政策规定。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和条例草案。会上的一些发言，与制定《后十条》时强调的精神已大不一样，提出了许多过火的不恰当的意见和措施。

## （三）《后十条》的修正和“左”倾错误的发展

《后十条》修正草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主要有七个方面：

1. 增加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的还是不好的六条标准；
2. 领导人必须亲自蹲点，要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做全部工作，并且要蹲两次；
3. 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提出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和贫下中农，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运动的根本分界线；
4. 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
5. 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6. 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补课工作；
7. 整个运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

此后一系列文件的下发，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国家经委党组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深入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写出的稿子，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单位都要划分阶级，要反对右倾思想等等，反映了“左”的精神，但没有完全照搬农村“四清”的提法。9月19日，我将这个稿子报送小平同志，并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我的不同看法。由于意见没有完全统一

起来，中央没有批发这个文件。

## （四）《二十三条》制定前后的思想分歧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

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

少奇同志强调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左”的做法。毛主席虽然说“现在还是反右”，“不可泼冷水”，但又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对中央领导层中的这些分歧，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不知道的。

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对“四清”运动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的“四清”运动已无法搞下去了。1966年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 三十九、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毛主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

## （一）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干涉和经济封锁，虽然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很难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因此，它们在使用“硬”的一手的同时，又采用“软”的一手。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讲话，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思想。

1959年11月，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深刻论述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从此，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1964年1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从此，全党全民的反修教育迅速展开。

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毛主席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除了本书的其他章节已经详谈的措施，还有其他两项措施。一是号召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机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二是改革有关制度，缩小三大差别。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但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首先，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其次，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所谓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再次，当时防止“和平演变”所采取的措施，有许多是不正确的。

## （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措施

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于1964年正式提出来的。在这以前，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脑子里，实际上早已作为一件大事在进行思考和酝酿了。

1964年6月，毛主席提出接班人的条件：“一共五点：马列、人民、多数、民主、自我批评。”

加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级特别是县和公社两级，在“文化大革命”前，都有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同时，党中央对教育制度、教育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一，改进招生主作，更加强调政治标准，并招收一定数目的优秀知识青年、退伍士兵、在职干部入学。第二，增设政治理论课，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第三，让青年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此外，还提出要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由于当时所坚持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选择的标准也不能不与这个“左”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选不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 **四十、试办托拉斯**

60年代初期，在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以改善我国的工业组织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应该说是我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的试验。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使这一工业管理改革工作被迫中断。

###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在“一五”时期主要是参照苏联的经验，由中央各部集中管理。这在开始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发挥过好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央集权过多，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束缚着企业的手脚。

大约在1960年春，中央考虑“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规划问题时，曾经议过托拉斯的问题。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没有作出具体部署。到1963年，经济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根据十来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已逐步发现单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管理企业存在不少弊端，造成对企业的多头行政管理，“婆婆多”，“小而全”，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浪费严重，以及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等，因而想吸收、实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托拉斯之类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和企业。

### **（二）试办方案**

国家经委党组在1964年6月间草拟出初步方案，即《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

报告首先分析了当时工业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认为它“不能适应现代化工业发展的要求”。

报告阐述了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决策的意义，认为组建托拉斯“是改进工业、交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项带有革命性的重要措施”。

报告说明了组建托拉斯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

关于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报告认为：“应当根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和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来确定，有的可以是全国性的，有的可以是地区性的，有的也可以既有全国的又有地区的。”

报告规定公司按以下办法管理：

1. 国家以托拉斯为统一的计划单位和经济核算单位，有关计划、财政、物资、劳动等各项经济管理体制均以它为基础托拉斯向国家承担经济责任。
2. 托拉斯内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和安排生产建设，综合利用资源，逐步形成产供销紧密衔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密切结合、大中小工厂相互匹配的生产体系。

试办方案还规定：全国性的托拉斯，在主管部的授权下，可以行使某些行业管理权限。

所以，试办托拉斯，不单单是上收一部分企业，也不仅仅是生产力结构的局部改组，而同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与改革。

### **（三）试办的初步成效和遇到的矛盾**

第一批试办的12个托拉斯，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以促进设备的充分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样做，时间虽然不长，却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试办初期，也遇到一些矛盾，出现过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举办全国与跨地区性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
2. 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
3. 托拉斯同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

### **（四）初步总结**

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国家经委党组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检查总结前一段的工作。这次会议的基本收获，就是明确了工业必须组织起来，必须根据经济合理性的原则解决各项矛盾。

座谈会搞了一个《会议纪要》，对有关问题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

1. 关于托拉斯由谁办的问题。应该根据工业、交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特点，实行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的办法。
2. 关于全国性托拉斯行业管理与上收地方工厂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
3. 关于托拉斯改组生产、调整企业的问题。要兼顾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经济合理性与国防战略，考虑两方面的需要。
4. 托拉斯要正确划分公司、分公司和厂矿三级的管理权限，把集中经营和分级管理结合好。

## 四十一、“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的展开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原应从1963年开始，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也都按此时限作了准备，并拟定了初步方案。这期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推迟到1966年开始。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毛主席提出从1964年下半年着手部署三线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并于1965年初成立小计委负责“三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因此，“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与最初的设想有重大改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身陷囹圄，与世隔绝长达8年，对“三五”计划的执行过程不甚了了。

### （一）“吃穿用计划”的提出

1957年到1962年6年间，全国按人口平均的主要生活资料的年消费量大幅度下降，吃的、穿的、用的全面紧张。

为了加强计划工作的领导，改革某些不合理的计划管理制度，并在编制计划时协调工业、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关系，李富春同志于1963年初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成立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邓子恢、程子华、薛暮桥8人组成的计划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接连开会，初步研究了长期计划和“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

5月中旬到6月17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设想》拟定“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加强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设想》还提出：同基本任务相适应，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兼顾国防工业的需要，然后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

## （二）三线建设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富有远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1964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1. 改变计划方法：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不符合实际。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 进行备战。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小三线。

## （三）成立小计委与备战计划的形成

毛主席对经济工作不满意，作为经济综合部门的国家计委自然首当其冲。而成立小计委，则是由陈伯达的一封信引起的。

1964年8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期间，陈伯达于20日写给李富春同志一封信，提出了他对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毛主席当即作了批示，指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1965年初，毛主席决定成立小计委。

随着大小三线建设的展开、备战气氛的增加，“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由重点解决吃穿用转向以备战为中心。

## （四）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持续10年之久，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人们的道德风貌都带来极大的危害。特别是前期，“踢开党委闹革命”，致使从中央部委省市自治区委到基层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造反派掌权，运动失控，对各级领导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胡批乱斗，继而闹派性、打派仗，扰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动荡，使“三五”计划的执行受到严重干扰

和破坏。

用发动全民运动的形式解决党内的的问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把干部对某些工作某些决策的不同意见和认识上的差异无限上纲，说成是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视为敌我矛盾，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更是极其错误的。

“三五”计划的部署，实际上是对国民经济的一次全面的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是：

1.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力求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2. 加强国防战备，在大三线新建一批骨干厂矿企业，一、二线的大批企业内迁，进一步改善工业布局，促进西南、西北广大内地经济的发展。
3. 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建设、国防建设中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应该说，“三五”计划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重大步骤。

应着重提出来探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 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
2. “散、山、洞”方针有严重的片面性。
3. 小三线也有很大的浪费。
4. 积累率偏高。

## 四十二、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随普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断升级，特别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性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 （一）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和各个领域批判的开展

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虽然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已经逐步展开，但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还是在毛主席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

第一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第二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

毛主席的这两个批示，对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对文联所属各个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大多数刊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文艺界立即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受到批判。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两个批示，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毛主席对文艺界和文化部继续进行了多次批评。

两个批示的做出，与江青、康生等人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文艺界的问题肆意加以渲染和夸大，也是分不开的。

## （二）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进入新阶段。

彭真、陆定一 etc 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抵制，18天内北京各报刊没有转载。毛主席看到北京按兵不动，立即指示上海把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12月21、22日，毛主席在杭州做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谈话。后来，这些分歧直接导致了《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的产生，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三）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二月提纲》，即由彭真同志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与毛主席当时的谈话精神有明显的不一致。

毛主席向彭真同志等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但是，彭真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作政治结论。

7月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根据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并以彭真同志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1966年2月3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是两种思想的初步交锋。会议《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许多提法，是同毛主席的意愿不相符合的。江青、康生等人，对《二月提纲》更是不能容忍。

毛主席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由此发动“文化大革命”。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

1. 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2. 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并于5月16日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主席做了八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通知》一发出，一场“政治大革命”即十年动乱就全面爆发了。

## （四）历史的教训和启迪

从1957年夏季开始，我们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看得太重了，夸大了，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放到了不适当的地位上，甚至以为把这件事办好了，社会主义就能巩固了。其实，经济才是基础。不仅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顺利发展的基础。

##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是指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的前夕。

十年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后到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虽然在1957年6月开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总体上讲，成绩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大规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2. 第二阶段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和开始批评“反冒进”、酝酿“大跃进”起，到1960年初冬。这个阶段，连续犯了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反对实际并不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继续“大跃进”等一系列严重错误。虽然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在纠正已经察觉的“左”的销误中，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终究由于对错误的认识比较肤浅，还没有觉悟到从根本

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因而在纠正错误中发生了严重的回潮。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工作上的失误是主要的，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3. 第三阶段从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并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到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前。这个阶段，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大兴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群策群力，艰苦奋斗，纠正错误，渡过难关。虽然纠正错误是限定在坚持“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雷池之内，纠正得很不彻底，但是，这个阶段，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总的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在恢复经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等方面，收到了显著效果。
4. 第四阶段，从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的发出。这个阶段，由于坚持“八字方针”，由于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试验。但可惜由于政策界限不清，经济工作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把本来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当成了阶级斗争，把一些本来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东西也当成了“修正主义”，并且将它逐渐引向党内的高层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因此，也就引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烽烟。

虽然经过严重的曲折，但总起来看，我们的国家，在这十年里，是在曲折中前进了。我们80年代初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 （一）关于阶级斗争

这十年，党中央、毛主席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上，有一些重要的经验，但更多的是教训。概括起来，这些经验与教训，主要有三点：

1. 坚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2. 对我国社会矛盾、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规模的估量，一定要从我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基本实际情况出发。
3. 切实按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和“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坚决同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方针划清界限。

## （二）关于经济建设

1980年初，我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我国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曾讲过四条意见。这就是：

1.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全党工作着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
2. 经济建设工作一定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做基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3. 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在不平衡里边力求平衡，搞好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
4. 要正确地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

这四条经验、教训，主要是就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情况讲的，是十多年前的认识。这里讲今天的认识：

1.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探索中前进。
2.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应该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
3. 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4. 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

## （三）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这个方面的具体经验与教训，我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农村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和试办托拉斯等几篇中，已经讲了。这里着重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失误谈三点意见：

1. 清醒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
2. 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一定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能从这样或那样的主观臆想出发。
3. 严格划清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时刻谨防和自觉抵制平均主义的干扰和侵袭。

## （四）关于党的建设

1. 党的各级领导人保持普通劳动者面貌，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
2.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是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
3. 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

怎样避免党和国家的工作因领导人观点的变化或领导人的交替而出现某些失误甚至发生某种曲折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积多年之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持实行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之一法。